

溯源篇

第一章 历史龙迹

海内外华人常常称自己为炎黄子孙，即传说中的炎帝和黄帝的后代。相传在“感天而生”的上古时代，有女“任姒”感“神龙”而生炎帝；附宝“感”北斗“而生黄帝”；庆都“感”赤龙“合婚而生帝尧。除了神龙、赤龙外，属于伏羲氏系统的还有上龙氏、飞龙氏、水龙氏、潜龙氏、长龙氏、居龙氏、降龙氏、白龙氏、墨龙氏、青龙氏等等。这些各式各样的“龙”实际上都是中华民族部分祖先在原始社会的族徽图腾。

数千年来，龙作为中国文化的特产，作为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瑞祥的动物，头角峥嵘、腾云驾雾、雄伟威武、生气勃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不仅被写进诗词里、绘入图画中、遍见于雕塑、刺绣，体现在音乐、舞蹈之中，更重要的是龙把海

内外炎黄子孙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大地被称为“龙的故乡”。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是“龙的传人”。凡有华人足迹的地方，中国城、唐人街、华人经营的书店、餐馆等等，几乎处处可见龙的图形，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都把龙作为自己的标记，散布五大洲的炎黄子孙都会被龙唤起亲切的感情。

“龙的传人”远离故土、移居海外的历史足迹，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诗经·商颂·长发》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孔夫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炎黄子孙已陆陆续续有人前往海外，并且其中一些人还居住了下来，他们可以说是迁移海外的最早的华人。现代著名学者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上册中引录了一段材料，也指出：“殷商之际，已有中国北部居民移至叶尼塞河中游，与本地居民杂处。”秦统一后，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入海求仙”，率3000名童男女和百工、武士，携带五谷种子以及日常用品，乘坐楼船，浩浩荡荡，扬帆东渡，历经千难万险，于日本北九州西海岸登陆后定居了下来，被日本民族尊为农耕、蚕桑、医药之祖。

西汉王朝建立后，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被战乱严重破坏的封建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政治也比较安定，对外交流以较大的规模开展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陆路交通。汉朝使者和商旅跋山涉水、络绎不绝地前往西域各国进行政治和贸易活动，大批中国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西亚、中亚及欧洲，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到了东汉时期，班超通西域，进一步把对外交往范围扩大到今地中海一带。无论是出使西域的使臣军将，还是经丝绸之路前往各国从事贸易活动的商贾，都有一部分留居未归而终老异国他乡，成为中

国封建社会早期定居海外的华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少人继续远离故土而迁往国外。仅据日本《雄略记》和《姓氏录》记载，当时中国人定居日本的已有近 2 万人。

到了唐代，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较为稳定和巩固的统一政权，较为发达的文化艺术，大大推动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往。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置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机构“市舶使”以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70 多个国家的使臣、商贾、学者、僧侣、艺术家等不断来唐朝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有数十万各国侨民住唐，有的人入了唐籍，甚至还有人在中国做官。同样，唐朝使者、商贾的足迹也遍布许多国家，有些人在异域长期居住了下来，有些人还与外国人通婚。直至今日，世界上不少地方的华人仍然自称为“唐人”，以中国为“唐山”，常用“唐物”、“唐字”、“唐文化”等名称。

唐代还有不少僧侣前往国外，如玄奘、鉴真等等。鉴真在 55 岁时，开始了 6 次东渡日本的壮举，前后历时 12 年，先后有 36 人献出了生命。鉴真到日本时，已经年近古稀，满头白发，双目失明。但他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同他的随行人员一起，把包括佛教、建筑、雕塑、医药、艺术、绘画、书法等在内的唐代文明全面地介绍给日本，10 年后病逝于日本。鉴真不愧为古代海外华人中的杰出代表，被日本人称为“日本文化的恩人”、“日本律宗太祖”、“日本医术之祖”等等。

宋元时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逐渐发展、海外贸易的日益繁荣以及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还由于国内政权更迭和战乱，中国商人、手工业者、水手居留在海外的就更多了，大多定居在今天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地的

中西交通贸易中心，人数大约近 10 万人。宋代地理学家朱或在他所著的《萍洲可谈》一书中写道：“北人（华人）过海外是岁不归者，谓之住蕃。”有些人“住蕃十年不归”。这些未返中国的人就是华侨。

明初尤其是永乐年间也是对外交流比较积极、活跃的时期。明太祖强调对外国要以德化服人、以恩惠感召。明成祖也实行怀柔政策，他在巩固政治统治、发展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向往在海外树立声望、享有盛名，建树四海安宁、万国来朝的功绩，致力于建立和发展以明王朝为主导的国际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从而有了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 前后 7 次 历时 29 年之久 共路经 30 多个国家 对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海外各国出于对明朝的敬慕，纷纷派遣使者和商人来到中国，有的国家连年来访 甚至 1 年来华二三次。明政权在郑和下西洋之外 也派遣大批使臣出访 配合郑和出使。同时 越来越多的商贾出海贸易。这些使臣、商人中，在异国土地上侨居下来的不乏其人。如明朝副使王景弘随郑和下西洋，行至印尼爪哇北岸时身患重病，郑和令其在附近的一个山洞里疗养，留下了 10 个士兵照料。王景弘病愈后，便与随从在那里定居下来。后来那里的华人逐渐增多，于是人们便把那个地方叫三宝垅，而把那个山洞称三宝洞，以此来纪念三保太监郑和。南洋还有不少地方把郑和奉为神明，建庙奉祀，至今香火不断。如苏门答腊有三宝庙，柬埔寨有三保公庙，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城和三宝井等等。

从明朝中叶海禁开放至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人侨居海外的人数迅速增加 达 100 万人左右，其中除了商人和政治避难

者以外，贫苦百姓尤其是沿海劳动人民占有很大的比重。由于中国耕地不足和人口急剧增长，有限的土地又集中在官僚地主手中，迫使许多无以为生的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飘洋过番谋生。在这期间，海外华人分布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东自日本、朝鲜，西至印度东部海岸，北起缅甸，南迄印度尼西亚群岛，几乎到处都能发现龙的传人之踪迹。而爪哇的下港和巴城、苏门答腊的旧港、菲律宾的吕宋、暹罗的大城、日本的长崎等地，更为华侨集中的区域，并且都有特定的华人居住区，保持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在当时海外华人社会中，主要从事两方面的经济活动：一是组成移民集团，在居住国政府力不能及的地方进行开垦和采矿；一是聚居在当时亚洲贸易交通中心，从事商业经营、手工业品制造、蔬菜种植和货物运输等。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少数拥资巨万的富商大贾，还有些人被当地政权任命为各级官吏，产生了一些华侨社团组织和华侨领袖，初步形成了海外华人社会。

第二章 潮涨潮落

虽然沿着历史的长河追根溯源，远在商周时代，中国人就开始移居国外，在几千年的岁月中，经历了缓慢的发展过程，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但中国人经常、普遍、大量地侨居海外并散布到全世界，却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在这 100 余年间 中国人出国人数

累计超过了 1000 万人 平均每年在 10 万人以上，足迹所至，远远超出了南洋、亚洲而遍及世界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从中国历史上看，近代中国人移居海外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从而奠定了今日海外华人的基础和格局。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古代中国社会固有的土地兼并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尖锐。不论在南方省份或北方省份 占地 3000 亩以上的大地主都已成为习见的现象，清朝皇室更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它直接、间接掌握了约占全国耕地面积 10% 以上的土地。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了土地 变成到处流离迁徙的“流民”。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猖狂入侵，瓦解了中国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引起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 使流民问题更加严重。因此 沿海省份尤其福建、广东的许多农民、小手工业者 在国内找不到出路 被迫远渡重洋，相率侨居国外，易地谋生。

而 19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开发他们在东南亚、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殖民地，加快了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正迫切需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美洲和大洋洲的采金热，横贯北美的铁路、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东南亚锡矿的开采 橡胶园的开辟 烟草的种植 香料的栽培以及城市、港口、码头、道路的大量建设，对中国劳动力的需求都成倍、成 10 倍地增加。清政府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改变过去的海禁政策，允许西方殖民者在中国任意招募劳工，使其掠夺、贩卖华工的勾当合法化。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鸦

片战争至 20 世纪 20—30 年代，一批又一批的华工象潮水般地离开祖国，流散到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形成了近代中国人迁徙国外的第一次高潮。

在这个时期出国的华人中，虽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自由身份前往海外，但更多的人却是通过所谓“契约劳工”方式被出卖、诱拐、胁迫甚至被绑架到外洋的，成为外国资本家的变相奴隶。他们充满苦难和辛酸的境遇，在海外华人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血泪斑斑的脚印。

“契约华工”是指失业破产的中国劳动者与外国资本家或代理人订立契约，应募到海外出卖劳动力，约定应募地点、工作性质、年限、工资等。实际上“契约”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外国资本家从不履行，而对华工来说，“契约”却是卖身契。签约后就丧失了人身自由，被当作会说话的“猪仔”装在船上，从中国运往世界各地。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华工在令人窒息的船舱里挤得象罐头沙丁鱼，吃的是猪狗食，受到骇人听闻的虐待、折磨和残杀。据记述：“所谓猪仔者累累登岸，囚首垢面，鹄形鸠面，……细验之则人皆生疮，人皆如鬼，设非船主虐待之深，何至如此。”因此，当时“猪仔”船有“海上地狱”之称。“猪仔”船上的华工死亡率高得惊人，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天气炎热，风浪颠簸，尤其是船主的迫害，饿死、病死、渴死、被打死、被抛下海淹死的达 1/4 以上，甚至高达一半。

到达目的地后，华工被剥光衣服，在市场上排列成行，进行拍卖，一名华工的售价由 400 至 1000 美元不等，而人贩子贩卖一名“猪仔”的本钱只需 150 元，暴利高达 2 至 5 倍。华工在极其繁重的劳动中死亡更多。东南亚地区的英属马来亚是契约华工比较集中的地方，从 1910 至 1920 年这 10 年中，华

工死亡率每年平均为 20% 比同一地区、同一时期当地居民的死亡率要高 7 倍 比当地西方人要高 23 至 30 倍。在秘鲁挖鸟粪的华工，每人每天被勒令必须挖鸟粪 4 至 5 吨。一处工地有 40% 的华工犯肿脚病 仍然被迫跪着干活 最后 4000 多名华工只剩下不到百人。在古巴的甘蔗园，华工每天至少劳动 14 小时以上，而月工资只有 4 元，相当于当地工人工资的 1/10 或 1/15。华工在体力日益耗尽的情况下 又缺少食物和卫生医疗条件，加上种植园工头的任意鞭打和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 甚至枪杀 因而在契约期满之前 就有 75% 的华工悲惨地死去。在幸存者中，“折手、坏脚、瞎目、烂头、落牙、缺耳、皮开肉裂指请验伤者已复不少”。

在这一时期 中国至少有 700 万华工到了世界各地 南洋地区的契约华工最多、最集中 新加坡则是贩运华工最大的中心。每年从汕头、海口、厦门、香港等地到达新加坡的华人有 10 多万人，70% 是“猪仔”。据有关资料统计，1881 到 1930 年到达海峡殖民地 新加坡和马来亚部分地区 的华人约有 830 万人，其中契约华工占了近 600 万名 大部分又被转运到了其他地区。人数众多的华工 有的在美国、加拿大淘金砂、修铁路、开矿、伐木 有的在古巴种甘蔗、在巴拿马开运河、在巴西种菜、在秘鲁挖鸟粪、在墨西哥种棉花 有的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种菜种烟、开挖金矿 有的在俄国开采阿穆尔金矿、修筑海参崴港口、兴建西伯利亚铁路 有的在马来亚种橡胶、在苏门答腊种烟草、在婆罗洲开田辟荒、在邦加和勿里洞开采锡矿，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南非和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斐济岛等等也都有大量的华工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这许许多多华工的血和汗，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为海外炎黄子孙的历史谱写了令人声泪俱下、难以忘怀，同时又是悲壮而沉重的一章。

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1949 年，是近代中国人出国的第二个高潮期。在“三座大山”的统治压榨下，中国大地政治紊乱，经济凋敝，内战不断，灾害频繁，民不聊生，破产失业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沿海省份部分劳动人民，沿着先辈的足迹出洋谋生，企图摆脱这种受剥削、受压迫的困境，人数达到了约 500 万人。

这次出国潮有过几次涨落起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一段经济繁荣时期，西方列强出于军事、经济侵略的需要，对殖民地投资的扩大和资源的掠夺以极大的规模进行，从而刺激了东南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的扩大及其他各项生产、流通事业的恢复。这无疑也促进了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极大需求，因此在 20 年代期间，沿海失业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出国外，其中 95% 以上都是来到了东南亚。但是进入 30 年代后，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加深，东南亚各国自然难逃厄运，工农业生产严重衰退，市场日益萎缩，对外贸易额迅速下跌，失业人数大大增加了。因此，东南亚各国都实行壁垒森严的限制华侨入境的政策，并猛增华侨的入境税、居留税，排斥迫害华侨的风潮也到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出国人数大减了。只是到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由于国内民族危机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出国的华侨人数才逐渐增多。珍珠港事件后，日军把战火扩大到东南亚地区，当地人民和华侨备受侵略者的欺凌和屠杀，海路交通线被战火隔断，陆路交通也困难重重。所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华侨出国基本上处于低潮状态。战后几年，东南亚地区进行经济的恢复

和发展，需要劳动力，饱受战祸之苦的中国人又开始大量出国，人数一度增长，不过没有达到 20 年代华侨出国极盛时期的规模。至于这一时期，中国人移居欧洲、美洲、大洋洲以及非洲的，只是极少数，当时世界华侨总数的 95% 分布在东南亚各国。

第三章 落地生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内人民生活的改善，飘洋过番谋求生路已不是广大劳动者唯一的希望了，同时新独立的东南亚各国相继限制华侨入境。因此，劳动人民大量出国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不过应该看到，海外华人世代相承，繁衍不息，加上每年仍有一定数量的人从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移居国外，所以今日海外炎黄子孙的人口绝对数依然有很大的增长。一般推算，目前有 3000 万左右的海外华人散布在世界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有 80% 加入了所在国国籍，渐由‘落叶归根’的华侨时代向‘落地生根’的华人时代转变。

“华侨”一词是指定居在外国的中国人。在中国历史上，对移居于国外的人起初并没有固定的称呼，可谓五花八门。唐宋以来，大多称为“唐人”，也称“华人”、“中国人”、“中国贾人”等等。进入清代后，还有“汉人”、“中华人”、“内地民”等等字眼。这种称呼不一的状况到鸦片战争以后才有所改变，一般多称海外的中国人为“华民”、“华人”，以及由此派生的“华商”、“华工”等。不过尚没有把“华”与“侨”结合起来使用。“华”是中国

之古称“侨”是旅居、客寓之意。清代以前“侨”字主要指国内流寓。清代以后，对国内流寓的和国与国之间移居的，开始混合使用“侨”字。到 1878 年，清驻美使臣陈兰彬在奏章中首先用“侨”字专指寓居国外的中国人。最早把“华”与“侨”相联系，形成专指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之称呼——“华侨”一词的人是郑观应。他在 1883 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南洋各埠华侨”。从此“华侨”一词逐渐传播、使用，成为寄居海外中国人的专用名称了。至今已沿用了 100 多年。

在旧中国，所有移居国外的华人，包括在当地国出生的华人后裔，都被认为是华侨。新中国成立后，情况不同了。我国政府为了妥善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华侨问题，以利于与各有关国家建立友好睦邻和相互信任的关系，于 1955 年宣布不赞同华侨的双重国籍，规定凡居住国外尚没有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公民（包括其后裔）才算为华侨，身居外国而取得外国籍的人就不保持中国公民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其为华侨了。现居海外的华人，除了一部分中老年华侨还保持中国国籍和侨居不久的青年人未取得外国国籍外，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所居国国籍，成为外籍华人了。

由于国籍的改变，也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心态的一系列变化。海外华人的经济基础已从国内转移到国外。他们把自身的发展同所居国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马来西亚，拥有市场价值 1 亿马元以上的 100 家最大挂牌公司中，华人直接支配的有 55 家，拥有 10 亿马元市值以上的公司数为 24 家，属于华资的有 13 家。在印尼，国家资本以外的私人资本中，华人经济力量比印尼原住民私营资本的经济力量

要强大 两者比例为 2.5 : 1。如从人口数量比例来看 占 97% 的印尼原住民私营资本投资额只有 11.2% , 而占印尼人口 3% 的华人共占印尼国内投资资本额的 26.95%。在菲律宾 , 华人所拥有的资本占该国总资本的 20%。还有新加坡、泰国等等 , 就不一一列举了。东南亚以外的国家中 , 海外华人的经济实力也有所增强。如在美国 , 据其商务部 1986 年底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称 : 亚裔今天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所拥有的力量已超过其他少数族裔 , 其中华裔已跃居各少数族裔榜首。华裔企业有 52839 家 居第一位 日裔企业次之 为 49039 家。华裔企业总收入为日裔企业的 2.2 倍以上 其中有 4 家华裔企业 (王嘉廉、蔡志勇、王安、刘立) 已列入美国 1000 家最大企业的名单。

海外华人的政治认同也已从祖籍国转向所居国。过去的华侨是以中国为依归的 , 他们为了谋生而流落异国 , 但父母妻儿在国内 中国是他们的“根”。拼命干活 , 节衣缩食 早日攒一大笔钱带回去和妻儿老小一起过好日子 , 是他们的最大愿望。即使客死他乡 , 也要留下遗言 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 使“魂归故里”。如今的华人是以当地社会为依归的 心态上从“落叶归根”转向了“落地生根”。个人与所居国发生了感情上的结合 , 认识到自己已是所居国的一分子 , 个人利益与所居国利益是息息相关的。所谓“他乡变故乡 故乡成他乡”就是这种变化的生动写照。

海外华人在文化教育上 , 由华文逐渐转向了英文。就拿华人占总人口 76% 的新加坡来说吧。1950 年全国小学学生人数中 , 57.9% 读华校 , 37.7% 读英校 , 7.2% 读马来学校 , 1.2% 读淡米尔学校。到了 1985 年 小学生 98% 读英校 只有 2% 读华

校。1987 年以后，全国全部小学生都读英校。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教育更是日渐式微。

尽管在海外的“龙的传人”属于不同的国度，持有各国的国籍，但他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宗教信仰等方面，与中国本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斩不断的亲戚关系和民族感情。

海外华人聚居地的唐人街，满眼望去，朱门宫墙，红檐绿瓦，中式店铺林立成群，中文广告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式的牌楼、中国式的亭台楼阁、古色古香的寺庙等等，到处呈现出浓郁的中华文化风格。即使住在别处的华人，也经常利用空闲日子到唐人街走走除了购买东西以外还可拜访亲友看看中医，碰巧看一场中国电影或家乡戏。唐人街上星罗棋布的中餐馆对华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平时华人家庭餐桌上可能是西式的牛排、煎饼或烤肉，但一到唐人街，很多人都要上中餐馆，吃上一顿具有中国家乡风味的饭菜、小吃，心中便会有一种满足感。红白喜事、同乡聚会、招待亲朋好友也多把中餐馆作为理想的场所。有一个美籍华人这样说：“走到了唐人街，心神就安定下来了。满满地吸饱中华气味，又把中华东西带回家，省俭着享受，然后精神舒畅地工作。唐人街所提供的不单是中国食物，还有精神力量。让来自四面八方、在异乡挣扎的中国人得到倚靠，不那么孤独凄凉！”

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经常讲述着“牛郎织女”、“花木兰从军”、“武松打虎”、“孙悟空大闹天宫”、“郑和下西洋”等等故事，如数家珍地讲起孔子、屈原、诸葛亮、关羽、包公、岳飞、郑成功等等历史人物。众多的华人家庭仍然继续过着中华民族

的传统节日——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冬至和春节。尤其是春节，大家喜气洋洋地按照故乡的风俗习惯，贴春联、挂彩灯、放鞭炮、祭祖拜神，除夕晚上全家团圆吃年夜饭。一些唐人街流行以“龙”和“狮”寓意中华民族之伟大的街头娱乐活动，五彩的巨龙、威武的醒狮穿街而过，人们围得水泄不通，龙腾狮跃，欢声笑语，好一派热闹红火的节日气氛。

海外华人的“落叶归根”观念虽然逐渐被“落地生根”所取代，但是他们仍然热爱故土、眷恋祖先之邦，“访祖寻根”成了海外千千万万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一批又一批地踏上了祖辈的土地，看祖屋，祭祖坟，寻找祖先的生活脚印。有些人还深情地装上一瓶故乡的甘甜井水和一包故乡的芬香泥土，作为珍贵的纪念品，带了回去。“寻祖访根”的男女老少，畅游神州大地，长江、长城、黄河、黄山等壮丽风光勾起了游子乡情，祖辈生活过的地方给他们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故土的水秀、山美、草绿、花香、人亲。

第四章 群星竞辉

美丽的仲夏之夜，满天闪烁着灿烂的繁星，光华夺目，令人神往。在这壮观、优美的星空中，中国紫金山天文台所发现的 3 颗小行星，经国际小行星中心批准，1990 年 5 月 17 日分别以海外著名华侨、华人的名字命名。这 3 颗小行星的国际编号分别是第 2752 号“吴健雄星”、第 2899 号“邵逸夫星”、第 2963 号“陈嘉庚星”。这样名震遐迩的杰出人物，在世界各地

“龙的传人”中还有许许多多，他们在经济、科学、政治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犹如竞辉的群星，交织在广阔的苍穹，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海外炎黄子孙社会活动的中心是经济事业。长期以来，他们远涉重洋，梯山航海，为了生存和发展，在侨居地胼手胝足，披荆斩棘，艰苦奋斗，为所居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海外华人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近几十年来，随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修改移民条例，华人人口出现一种由东向西迁移的现象。而东南亚某些国家政局动荡和实行排华政策，加上香港、台湾的资本对外输出，华人投资区域逐渐扩大到美国、加拿大、巴西、智利等美洲国家和澳洲、西欧等地。尤其以南北美洲的发展速度最快，形成了仅次于东南亚华人经济的又一个中心。

在投资地区扩展的同时，海外华人经济逐步由“以商为主”转向了多行业的全面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华人经营的传统行业是餐馆、洗衣、零售商业以及开设小手工艺店、小修理铺等等。在欧美地区，除去商业，涉及其他经济部门的华人几乎寥寥无几。日本华人经济被称为“三把刀”，即菜刀（餐馆）、剪刀（裁缝）、剃刀（理发）。东南亚各国华人的投资，一半以上集中在商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外华人经济突破了传统的经营范围，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更广泛地向各行各业发展，几乎各个经济部门都有华人企业家在大显身手，其辉煌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海外炎黄子孙在国际航运业占有重要的地位。包玉刚的环球航运公司拥有 200 艘载重量超过 2000 万吨的船队。美籍华人董浩云创立的金山船务公司，拥有各式船只 160 多艘，载

重量达 1300 万吨。他们两人同列世界七大船王。新加坡华商拥有的船舶吨位仅次于包、董，并在迅速增长中。日本、菲律宾、印尼等国的华人也拥有一些船队。据不太精确的统计，目前海外华人拥有船舶约占全球总数的 15%，达 7000 万吨载重量。

在金融业，海外“龙的传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据美国《金融月刊》1984 年公布，世界各国资产超过 10 亿美元的十二大银行家中，有 5 位是东南亚华人，即新加坡华侨银行的李成义、丰隆集团的郭芳枫、泰国盘谷银行的陈弼臣、印度尼西亚亚洲中央银行的林绍良、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的郭令灿。泰国目前全国 16 家注册银行，均有华人资本，并且以华资为主的银行占 11 家，华资银行在国内外设立的分支机构有 1000 多家，是各国华人中金融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近年来华资金融业的发展很快。纽约唐人街的华人银行已有 30 多家，已成为全市仅次于华尔街的一个金融中心。

海外华人在房地产业中异军突起，出现了新加坡的陈子兴、李金塔，马来西亚的李延年，菲律宾的郑周敏，日本的刘秀忍，香港的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等房地产巨子。澳大利亚悉尼市 1980 年由东南亚及香港华人购买的地皮和建筑物就值 1 亿澳元，这几年来仍在不断地购进。加拿大华人拥有房地产总值达 50 亿加元左右，其中温哥华的房地产有 1/3 属于华人。日本现有华人房地产公司 100 多家，他们或购买地皮进行平整改造，然后转手卖出，或兴建公寓、大楼，出售出租。有人估算，日本华人拥有的房地产价值当在 20 亿美元以上。海外华人在美国的房地产业也日益兴旺，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团体的估计，进入 70 年代以来，华人在美国各城市购置的房地

产 平均每年超过两亿美元 至今仍保持着上升势头。

海外华人经济在工业领域有了很大的发展。菲律宾最大的 100 家工厂中 华人占 1/4 其资本额占这 100 家企业总数的 17%。据统计,华人在菲木材加工业及建筑材料业中占 40% 在钢铁及金属制造业中占 70% 在纺织、服装工业中占 75%。泰国华人在冶金、机械、车辆装配、化学原料及加工业中占 40% 在纺织、漂染、服装、食品加工方面的投资占全国总数的 60% 在电工器材、家用电器、碾米、榨油、锯木、饲料、陶瓷等领域也占 60% 的比重。除东南亚各国外 华人经营工业数量较多、规模较大的是在美国。美籍华人所拥有的国际性大企业,有王安电脑公司,经营金属加工及电子配组件制造的唐氏工业公司,制造国防、航空及太空工业器材的陈全工业公司,提炼钨等稀有金属的华昌公司等。

随着海外华人经济的蓬勃发展,一些巨大的华人企业财团开始崭露头角,其中一部分甚至已成为跨国的大资本集团,产生了一代国际级的海外华人实业家。印尼的林绍良、马来西亚的郭鹤年、菲律宾的陈永栽、泰国的谢国民、香港的李嘉诚和包玉刚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经济实力已能与欧美的一些一流企业并驾齐驱。

中华民族有着尊师重教、勤奋好学的优良传统,海外华人家庭历来十分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地的华人更不甘心世世代代种地、做工 宁可省吃俭用 也要想方设法送孩子上学读书。海外“龙的传人”之第二代、第三代 知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有相当一部分上了大学。在东南亚地区还出现了送子女到美国、日本和西欧各国留学的热潮。泰国、马来西亚等国赴国外留学的